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道路理论及其中国意义

——兼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哲学基础

崔唯航

摘要:马克思主义现代化道路理论的核心在于通过对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特定现代化形态的批判,探索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新型现代化道路,进而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化形态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必然走向终结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现代化道路理论的精髓在于具体化,即一个国家和民族走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不能从任何“先验公式”中“推演”出来,而必须深入到社会现实中去,立足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际,走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道路理论的中国形态,书写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新篇章,具有极其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资本主义;唯物史观;具体化纲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百年奋斗,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高度出发,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学理支撑,是哲学工作者无可推卸的职责和使命。要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必要前提是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现代化道路理论及其当代意义。考察马克思主义现代化道路理论,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中,直接讨论现代化道路问题或以现代化道路问题为关键词的文献十分缺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关注这一问题,更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思考过这一问题。事实上,他们十分关注现代化道路问题,特别是对于落后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道路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只不过这一思考往往与他们对资本主义及其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和批判交融在一起,表面上不那么突显而已。这就要求我们深入领会马克思恩格斯与此关联的问题意识和表达方式,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现代化道路理论的精髓要义,特别是其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指导意义。

一、对德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现实与哲学的“时代错位”

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对德国现代化道路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这一思考对其世界观的转变具有重要影响,激发其思考的重要切入点是在德国哲学与德国现实之间存在的“时代错位”。在此,马克思是立足于哲学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来探讨德国现代化道路问题的,因此,对德国哲学的讨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明根基和理论支撑研究”(项目号:2022YZD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崔唯航,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就是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

美国学者特里·平卡德(Terry Pinkard)曾经对近代德国哲学作过这样的总体判定:“实际上,他们(德国哲学家——笔者注)当时正经历着向现代生活的剧烈转变,而这影响了他们对所有事情的理解。为了理解德国哲学,我们必须谨记,如黑格尔所言,真理是整体,观念和社会结构不能被截然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并且它们是相互从属的,有时会相互适应,而有时则会相互对抗并引发某种改变——而且‘改变’在当时的‘德意志’的确是流行的。”^①法国思想家弗朗索瓦·傅勒(Francois Furet)在《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中指出,马克思一生都在“全神贯注于发明一场新革命的想法之中:这次是一场德国革命,在历史作用上,这场革命将会超越并且完成法国的解放”^②。在此,两位学者以不同视角揭示了贯穿近代德国哲学中的共同理论主线,即身处变革时代的哲学家立足德意志民族发展状况,试图提出一整套改变德国落后现状的方案。这一努力在马克思之前的德国哲学家那里,主要表现为运用人类所特有的理性能力去完成对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

康德在《历史理性批判》中提出在德语中存在两种历史(Geschichte与Historie)的区分,指出Geschichte更多追问作为自然过程之历史的起源,而Historie却热衷于对作为自然过程之历史的“描述”^③。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在《现时代的根本特点》中将人类历史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其中“现时代”作为一个中间环节连接起两个不同时代:这两个不同时代被费希特分别命名为黑暗世界与光明世界,抑或说是强制世界与自由世界^④。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描绘了对一个新时代到来的满怀希望之情:“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时代,一个向着新时期过渡的时代。精神已经与这个绵延至今的世界决裂,不再坚持它迄今的实存和表象活动,而是打算把这些东西掩埋在过去,并着手进行自我改造。……这种渐进的、尚未改变整体面貌的零敲碎打,被一道突然升起的闪电中断了,这闪电一下子就树立起了新世界的形象。”^⑤这一“新世界”就是正在形成的现代社会。

在马克思之前,德国古典哲学家试图运用理性的原则完成对不同历史时代的划分,所体现的是他们对从传统到现代转变之“惊险一跃”的理解方式。在德国古典哲学家那里,现代化进程表现为一种强大的历史理性,必然要裹挟不同国家沿着相同道路展开自己的历史进程。比如,黑格尔运用他特有的理性架构方式来把握人类历史,将每一个地区或者民族的历史都纳入其所预先规定的三个历史时代,其中最高的发展阶段正是日耳曼民族所处的当下这个时代。在这样独断的历史哲学视域下,现代化过程成为具有必然性、唯一性和普适性的道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黑格尔构筑这一现代化进程的理性方式,在落后的德国现实面前显得十分苍白无力。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第一,德国的现状落后于其所处的时代。相对于当时的法国和英国,德国落在了时代的后面。“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激烈反对的、然而却又像戴着锁链一样不得不忍受的陈旧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做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⑥第二,相对于落后于时代的德国现状,德国的哲学却与时代同行并进,处于同一水准,这样,在德国哲学与德国现状之间就存在着一个“时代错位”。“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

① 特里·平卡德:《德国哲学1760—1860:观念论的遗产》,侯振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

② 傅勒:《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朱学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③ 参见康德《论目的论原则在哲学中的应用》,载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页。

④ 参见费希特《现时代的根本特点》,沈真、梁志学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8—19页。

⑤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人。”^①换言之,德国的哲学已经走到了现代化进程的前列,但德国的现实还未完成法国和英国已经完成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出现了哲学与其所处时代之间的“错位”。

马克思直面这一“时代错位”,认识到哲学的任务不是像德国古典哲学家所做的那样,为阐释人类的历史和未来提供一种理性方案,由此让哲学成为超越时代的产物,而是相反,哲学不得不承担起对特定时代的现实批判任务。因此马克思关切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完成抽象的哲学批判,而是“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②他要完成的是双重的革命,具体而言:第一,将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第二,将其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其实质在于:一方面,马克思试图完成一种德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另一方面,马克思试图借助对德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思考,来完成对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化模式的批判和超越。尽管对当时的马克思来说,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还并不明朗,但最终超越这一特定现代化,却已成为马克思理论探索的最终旨归。

由于1843年的马克思还未投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系统研究中,还未能完全把握资本主义的内在架构和运行规律,因此这时马克思对于德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更多诉诸激进的革命:“向德国制度开火!”^③这些讨论的展开还停留在一些原则高度,缺乏一种现实的、建设性的理论主张。但这篇宣言式的经典文献却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道路理论提供了重要基础。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对于落后德国之“时代错位”的揭示彰显了落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思想启蒙与社会经济架构之间的矛盾及其相互关系,凸显了思想启蒙对于落后国家现代化进程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和作用。第二,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需要诉诸“实践”,即德国能否将自己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只能诉诸“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④。这一实践指向,注定让马克思对德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转向对特定时代问题的研究,而不是像德国古典哲学家那样单纯诉诸普遍理性的预设和建构。由此,马克思一方面积极介入到现实斗争当中,参与到诸如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建设中去,另一方面,逐步展开有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相关工作,其目的也是为现实的改造世界的行动探寻理论基础。接踵而来的问题是,这一理论建构是否是一种新的哲学呢?回答是肯定的,但必须补充说明的是,这种新的哲学并不与这一时代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严格说来,这一哲学源于他的时代,却又高于他的时代,因为它试图推翻的是“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⑤。这意味着,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乃是唱响人类解放的“高卢雄鸡”,将引领人们超越资本主义,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对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特定现代化形态的批判和超越

马克思关于现代化道路问题的思考,很大程度上是与对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特定现代化形态的思考和批判交融在一起的。在他看来,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资本主义代表了现代化的一种典型形态,因此对现代化道路问题的思考,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和考察。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针对德国工人在抽象和普泛意义上滥用“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的情况,对现代社会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作出如下界定,“‘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①,换言之,在资本主义获得典型发展的“西欧”语境中,现代化道路的进程即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演化的进程。对于这一特定现代化进程,马克思强调了两个方面:其一,现代社会具有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只是这种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罢了。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征。”^②其二,现代社会在其形成过程中,“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③。由此可见,即便仅囿于西欧语境,马克思也已经发现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不同国家之间也存在特殊性。因此他指出德国工人党纲领中以抽象的普泛性的表述来谈论“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完全是一个非历史的态度。

对于资本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马克思持有两方面观点。首先,充分肯定资本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④这种革命性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极大程度发展了生产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⑤其二,有效拓展了世界市场,促进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⑥从此以后,“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⑦。这个世界,就是现代世界,就是以资本主义为典型代表的现代化世界。

如果说世界市场在那个年代还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推演,但现在却成为最基本的社会现实。资本在大力推进世界化交往和流通的同时,也带来对旧有社会关系的颠覆性破坏,这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特定现代化进程予以批判和反思的起点:“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⑧

在这一略带浪漫主义色彩的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彰显了他们把握现代化进程所特有的历史性视角:一方面,现代化进程展现了一种历史发展中的“时代断裂”。正是这一现实的“断裂感”,让包括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等哲学家体会到一个不同于古典时代的新时代的到来,亦即现代社会的诞生。只是在康德与黑格尔那里,表现出的更多是一种拥抱新世界的喜悦。因为在19世纪初期的德国,工业化与大机器生产还未实现普遍化,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特定新时代对于仍然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德国而言,还是一个美好的梦想。但当时间延伸到1848年,资本主义进入加速发展期,逐渐露出自己狰狞的面孔。永无休止的社会变革虽然推进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积累,但也让“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⑨。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逻辑的批判并不局限于对这一断裂化的体验予以生动刻画,相反,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3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3页。

更着力于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架构,即以市民社会为核心的经济架构进行批判和研究。由此决定了他们在1850年之后关于资本问题的分析路径,其理论旨趣在于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探讨一种超越资本主义之可能的现代化道路。换言之,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特定现代化形态,并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人类社会通向美好社会的一个环节,简言之,是必然走向终结的历史。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现代化道路理论的核心在于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探索一条超越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特定现代化形态,以达到一种新的现代化类型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俄国道路与对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批判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批判构成了其现代化理论的核心问题,但激发这一问题的契机却是对近代德国走向现代化之可能性路径的思考。严格来说,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形成和发展的研究起点是特殊性的,即立足于当时德国的社会现实,其有关资本主义的讨论并非为了寻找一个普适于任何社会的发展模式。面对以资本主义为轴心的现代化浪潮,马克思一方面指认现代化进程对人类社会的共同影响,这蕴含了一个普遍性维度,另一方面探寻超越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化模式,再度以特殊性视角审视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只有这一特殊性逻辑被确立起来,人类社会才有可能超越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化模式。概言之,马克思的现代化道路理论不仅始于对特殊的德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而且落脚到各个不同国家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以达到他扬弃资本主义的根本旨趣。从大的逻辑上看,大致经历了一个从特殊到普遍,再从普遍到特殊的历程。

正因如此,马克思在晚年不仅留下大量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在其中展开了对人类社会状况之丰富多样性的探索,同时还留下了讨论俄国问题的多封书信,包括《给查苏利奇的一封信》《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等,在其中不仅对是否能够跨越卡夫丁峡谷,即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思考,而且还从根本上对于人类社会是否具有普遍性规律、是否遵循普遍性道路问题提出看法。在此我们以《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为主要文本,来研究马克思对于不同国家现代化道路之特殊性的强调。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是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遗稿时发现的,马克思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了与俄国民粹主义者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进行论辩。后者曾在《祖国纪事》发表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科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的文章。这篇文章虽以捍卫马克思思想为名,批判庸俗政治经济学家茹科夫斯基,但却因为没有能够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思想,结果不仅未能切中批判对象的要害,而且还可能导致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

正是在与米海洛夫斯基的论辩中,马克思阐发了现代化道路中的特殊性问题。他明确指出:“我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①马克思在此把自己所倡导的理论——唯物史观与“历史哲学理论”作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分,那就是历史哲学理论关注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0页。

是“一般发展道路”,是可以不加分辨地推广到一切民族中去,是一切民族都注定要走的“一般发展道路”。相对于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一般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则是特殊的,并且对这种特殊性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仅在同一封信中,马克思就给出了两点重要说明。

第一,空间的维度。马克思将自己理论的考察范围限定在“西欧”。他是这样写的,《资本论》“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①。值得关注的是这里的“只不过”一词,这意味着马克思考察的仅仅是“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途径,而不是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必经道路。

第二,时间的维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受的命运,他们本来耕种自己的土地,但在历史过程中,他们的土地被剥夺,成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人,按照马克思所揭示的“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他们将成为发展资本主义所必需的雇佣工人,但历史事实是,“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②。

这一根本性差异也引发了马克思一个意味深长的感慨和结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③。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套用到空间维度之上,那就是: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国家、民族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在唯物史观视域中,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只有一条,而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换言之,俄国道路可以不同于英国道路,其他亦然。这同时就意味着,那种仅仅着眼于发现和提炼“一般发展道路”,并致力于将其推广运用到一切地域、一切民族的“历史哲学理论”,将不可挽回地走向终结。在现代化发展道路问题上,超历史的“万能钥匙”并不存在。诚如马克思所说,“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④。换言之,使用“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张“旧船票”已经登不上现代化的“客船”。

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唯物史观的具体化纲领

既然条条大路通罗马(现代化),既然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张“旧船票”已经登不上现代化的“客船”,那么,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的前所未有的今天,面对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如何从理论上有效回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和未来走向,揭示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成为理论工作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关键还是要回到唯物史观,回到唯物史观的历史道路理论,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现代化道路理论。其实,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已经对历史发展道路问题从正面给出了一个关键性提示,“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⑤。再考虑到紧随其后的是马克思对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批判,尤其是指出它是“一把万能钥匙”和“超历史”的,这可视之为反面提示。结合起来看,马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0—73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0页。

思现代化道路理论的关键在于具体化,即不是试图超越具体历史语境,进行抽象概括,以发现一把可以适用于一切地域、一切民族的“万能钥匙”,而是植根具体历史语境,深入到社会现实中去,对“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从具体分析中寻找具体答案,通俗地讲,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这意味着尽管马克思也对人类历史发展道路进行过一些科学抽象概括,但他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换言之,适度的抽象概括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需的,但不能将其视为可以脱离具体境遇的普世性的“药方或公式”,因为这些抽象概括一旦离开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绝不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①

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马克思现代化道路理论的精髓就在于具体化原则或纲领,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现代化道路,只能从这个国家或民族的具体实际出发,研究其实践发展的具体规律,在遵循自身规律的基础上,走自己的道路;而绝不能从任何“先验公式”或“药方”出发,推演出一个“合理”的现代化道路,并将其强加到实践之中。就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明确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

现在回到中国,回到历史,回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从那时起,什么样的道路能够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什么样的道路能够带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什么样的道路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领中国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简言之,走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就成为困扰无数中国人的世纪之问。

这条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曾经走过一段曲折道路。我们党的一些早期领导人一度深受教条主义影响,把俄国革命道路看成可以运用到一切国家的“先验公式”或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加分辨地强加给中国革命,推行“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结果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今天我们当然能够很清晰地看到,导致失败并付出代价的原因,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也不是俄国的经验,而是被当作抽象原则的东西极大地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并且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漠不相干。”^③换言之,教条主义的要害在于,不是深入到中国社会现实之中并以之为出发点,而是从抽象原则出发,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具体化纲领。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痛,从惨痛的实践中认识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国情,毅然放弃“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俄国道路,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说:“中国革命有中国的特点。苏联革命采取苏联当时的形式,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④同样道理,中国革命采取自己的形式,也“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9页。

③ 吴晓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④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启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新征程。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贡献,是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路线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从实践中闯出了一条新路、好路,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之所以能够闯出这条“新路、好路”,实现伟大跨越,离不开对中国现实的准确把握,离不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③。因此,必须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之中,坚持从现实出发,一刻也不能脱离中国现实,唯有如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能够越走越宽广。

不断回首走过的道路,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是我们过去能够成功的原因,也是未来继续成功的保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实践,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道路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历史进程产生了两大不同形态的成果,其一是理论形态,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其二是实践形态,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强调的是,这二者不是互不相干的孤立存在,也不是相互并列的独立存在,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整体。换言之,它们乃是同一历史“事件”的正反两面。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将走向一条不归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难以想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难以想象;反之,没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意义,或将成为一门仅限在课堂上讲授的理论学说而已。但历史就是历史,现实就是现实,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交融互动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跨越,书写了世界社会主义新篇章,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在人类文明进步的辉煌史册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具有极其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责任编辑:付婷】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344页。